

穿破历史迷雾 俯瞰千年转场

张明

看点 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不少有关五代十国史的重量级论著,有厚积薄发之势。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热播,对于想进一步了解五代十国历史的读者来说,杜文玉教授最新力作《五代十国史》可视为速读的教科书。这部断代史系统梳理了当时各个政权历史的兴亡,带读者从官制、军制、律法、经济、文艺、宗教等方面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作全景式浏览。同时也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发展活力,全面回应了所谓五代十国是完全乱世的陈旧认知。



在长期以来的学界认知中,五代十国都处于历史叙述的边缘,或被视为强唐弱宋的余绪,或被看作宋世辉煌文治的前缘。“承唐启宋”是五代十国时期最重要

的历史定位,其并没有被作为历史主体性。而在社会大众的观念中,对五代十国的认识可能就是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武夫跋扈这样的简单定论,并且这种模糊的印象也会因为与其他乱世相混杂导致更加难以区分。不过近年来学界已经出现了不少有关五代十国史的重量级论著,隐有薄发之势。而在这一趋势中,杜文玉教授贡献颇大。

杜文玉长期深耕隋唐五代史领域,是国内学界较早从事系统性五代十国史研究的学者。几十年的研究沉淀,使得杜文玉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兼具深度与广度,从军政大事到社会文化,从经济生活到民俗信仰,都有所建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杜文玉在五代十国史研究领域内最措意于号称难治的典章制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代十国史》正是杜文玉的最新力作,可以看作是其学术功底与历史视野的集中展现。

《五代十国史》在历史格局上并不限于传统的“五代十国”范畴,而是还原了这一时期多元政权并立的真实历史格局。从传统史学中继承过来的“五代十国”概念,因时代局限和史学正统观念的影响,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当时的政权状况和政治分野。以盛唐为原点观察唐宋之际的政权演变,可以发现敦煌归义军政权、党项定难军、李茂贞秦岐政权、大理国以及辽国,不仅在盛唐的版图之内,而且也直接继承了唐朝的制度和文脉,并演化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另外,十国中的大部分政权也是在晚唐时期就已经具备雏形,它们将唐制度和文脉发展出了不同的样貌。

如果不以正统史观来判断这一时期各政权的重要性,就能得到很多不同的历史认识,比如辽与北宋互称南北朝其实颇有历史依据,宋朝到底是继承了唐制还是五代之制等。《五代十国史》在前三章中正是采取了新的历史观,将以上五代和十国之外的政权也纳入研究范畴之内,这些长期被遮蔽的重要政权以及辽与五代十国的密切交往纳入完整叙事,正视了“五代

十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这种严谨的史学处理,让五代十国不再是中原五朝与南方十国的简单拼凑,而是一幅北方、南方、边疆政权相互交织、彼此博弈的多元历史画卷,也让读者得以窥见当时中国疆域内各区域的发展脉络与互动关系。

颇值得称道的是此书前三章在论述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变乱时,并非是传统艰涩的行文,而是以流畅的文字讲述历史,将复杂的政权博弈、制度演变转化为易懂的历史叙述。同时,书中对历史现象的深度分析,如燕云十六州割让的多重历史解释,各政权接班人选择的宗法原则与现实博弈等,让读者在了解历史事实的同时,更能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说此书前三章做到了让历史爱好者能够轻松读懂,让专业研究者也能从中获取学术养分的较好平衡。

对这一时期典章制度的深入研究,是《五代十国史》最具学术价值的内容之一。以往的五代十国断代史中,或因典章史料匮乏,或因学界前期成果不足等原因,对典章制度的论述往往浅尝辄止。而杜文玉则大力收集整理和重新审视传世文献,并结合新出土文书和石刻文献的基础上,在书中第四至第六章中,从选官、职官、军制、教育、法律等多个方面,系统考证了这一时期典章制度。

在科举选官制度方面,既指出五代科举出现进士科报考人数减少、明经科成为主流的现象,反映出当时士人文化素质整体下滑的情况,也肯定了乱世中各政权对科举制度的坚持与延续的历史意义。在职官制度上,系统梳理了枢密院、殿阁制度等具有长时段影响的典型制度,提出了很多创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在分析此类重要制度和机构时,是将其还原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而不是机械地就制度论制度,从而能够指出五代后期枢密使权势凌驾宰相,郭威更是以枢密使身份登基称帝,这一特殊历史现象正是五代制度不完善与武人专政的体现等符合历史发展阶段的论断。

在军制方面,书中不仅梳理了中原王朝的禁军制度、地方兵制,还系统探讨了吴、南唐、前后蜀等十国的兵制特色,通过对比各政权军制与唐制的差异,揭示了不同政权的统治特性与军事格局。这仍是截至当前对五代十国军制最全面系统的考述。

从这些细致严谨的典章制度考证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五代十国并非是礼崩乐坏的制度废墟,而恰恰是对制度最为混乱的晚唐时期的逐渐拨乱反正。更可以证明杜文玉早有撰文所阐述的宋承五代之制的观点,即宋代的诸多典章制度并非直接承袭盛唐体制,而是在五代制度探索的基础上调整、完善而来。

《五代十国史》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发展活力,全面回应了所谓五代十国是完全乱世、毫无可称道之处的陈旧认知。在书中第七到第十章的论述中,从混乱程度上看,晚唐可能更符合大众对所谓乱世的认知,五代十国反而并非唐末军阀混战的简单延续,倒是呈现出从局部统一逐步走向大范围统一后的稳定发展趋势,中原五朝与各割据政权在各自辖区内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相对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最显著的经济方面,农业商品化趋势显著,出现了专门的大规模商品农业种植区域;手工业新兴行业涌现,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对外贸易完成了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陶瓷之路的转型;货币经济也取得重大突破,贵金属白银正式进入流通领域。因而,杜文玉认为五代十国是中国古代史诸乱世中唯一经济没有出现反复的时期。

作为一部有深厚研究积淀作支撑的断代史著作,《五代十国史》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在学术层面,此书既是杜文玉教授多年潜心研究五代十国史的阶段性总结,也为该领域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宋之际,五代十国并非只是简单的历史过渡时期,其自有重要历史价值。

文学巨匠的另一种真实:天才的囚笼与翅膀

姜苒苒

安德烈·佐林的《托尔斯泰小传》完成了一次深刻的逆转。他笔下的托尔斯泰不再是《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的执笔者,而是这些作品的第一读者与剧中人。

这部两百余页的传记,以“壮志的孤儿”“已婚的天才”“孤独的领袖”“逃走的名人”四章精悍框架,给出了一个具有穿透力的论断:托尔斯泰的艺术,本质上是生命的艺术。这不仅是指他的作品取材于生活,更是说他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生命行为——一种与自我搏斗、挣扎中求存的生存方式。在佐林看来,托尔斯泰终其一生未曾走出婴儿时期那个“被捆绑”的记忆:渴望自由却被热爱束缚,愈挣扎愈痛苦。而艺术,恰是他为自己松绑的唯一尝试。

佐林捕捉到托尔斯泰创作行为与

生命状态之间的同构关系。托尔斯泰不是在写作之余“体验生活”,他是在写作之中经历生命。当我们看到这位19岁的贵族青年为自己制定涵盖法律、医学、农学、历史、语言、艺术的庞大学习计划,又因无法完成而陷入严苛自我谴责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未来小说家的工作方法,更是《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式的自我完善冲动。

传记揭示了托尔斯泰如何在创作中提前活过了自己的人生。托尔斯泰从未满足于做一个客观的叙事者。他笔下的人物是他自身可能性的延伸,是他未选择的路、未成为的人。艺术不是对已完成生命的总结,而是对尚未确定的生命的探索与预演。这正是“生命的艺术”的内涵:将生命文本化,再将文本生命化。

纳博科夫将《伊凡·伊里奇之死》视为托尔斯泰“最具有艺术性、最完美、最成功”的作品,正是因为这部中篇小说完美融合了技艺的精准与存在的重量。伊凡·伊里奇临终时发现“找不到死亡”,因为死亡已被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所取代——这是哲学,也是叙事;是伦理,也是美学。正如佐林所洞见的,托尔斯泰的“生命”与“艺术”从来不是两个概念,而是同一挣扎的两面;他在艺术中追求的生命真实,恰恰是在现实中无法企及的高度;他用生命践行的道德理想,又成为艺术最坚硬的质料。

“促使托尔斯泰笔耕不辍的原因,是他希望让人们爱上生活。但他自身的戏剧性在于,完成了任务之后,他发现自己无法热爱生活,不仅如此,他非

常憎恨生活。”托尔斯泰在82岁高龄离家出走,病逝于一座无名小站。佐林从未将托尔斯泰神化为道德完人。我们看到这位“已婚的天才”在家庭幸福与创作狂热间的撕扯,看到这位“孤独的领袖”在门徒崇拜与自我怀疑中的摇摆。他不是圣徒,甚至不是合格的丈夫与父亲;但他是一个绝对真诚的人——真诚到必须将自己的虚伪也写进小说,真诚到晚年为自己曾经拥有土地而羞耻,真诚到宁愿抛弃一切也要追上那“在黑暗中发亮的光”。

艺术不是逃离生命的手段,而是承担生命的形式。托尔斯泰相信,在小说的形式中人可以无限地逼近答案。托尔斯泰留给世界的不是十三卷小说,而是一个人如何用一生去活、去写、去错、去悔、去爱、去挣脱的完整记录。

读到

团圆,祖荫与远方

李海卉

春节的核心场景:阖家团坐,围桌共食。两件事都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不再追问它们从何而来、为何如此。许燎光的《祖荫下:传统中国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以下简称《祖荫下》)与蕾切尔·劳丹的《美食与文明:帝国塑造烹饪习俗的全球史》(以下简称《美食与文明》),恰好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一本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西南小镇,一本纵贯五千年全球版图;一本是微观社会的民俗志,一本是宏观历史的跨国叙事。放在春节读,互为注解。

《祖荫下》是许燎光在云南大理喜洲镇的田野报告。1941年至1943年,这位年轻的人类学家,在抗战炮火中完成了中国家庭研究的经典样本。喜洲人的堂屋正中,基本上都供着神龛。许燎光细致记录了那些祖先牌位的位置、祭祀的仪式、家产的分配规则。他提出一个核心概念:中国人不是活在自己的名下,而是活在“祖荫”之下。祖先并未离场,他们是家庭的隐形成员,参与分家、婚嫁、置业、迁徙。许燎光没有将“祖荫”简单理解为束缚个体的桎梏,他发现,祖荫与个人是互惠关系。光宗耀祖需要个人奋斗,而个人奋斗的成果反过来强化祖荫的威望。

城市化拆散世代聚居,核心家庭取代复合家庭,祭祖仪式简化甚至消失。《祖荫下》问世80余年,是当时中国家庭智慧的精准提炼,如今书中的具体生活形态已剧变。但许燎光揭示的逻辑依然有效:祖荫的本质不是牌位,是代际间的责任传递。它不必在祠堂延续,也可以在电话、微信、年夜饭座次和家族群转发中延续。形态可变,结构犹存。

如果说《祖荫下》解释团圆的“人”,《美食与文明》则解释团圆的“物”。蕾切尔·劳丹的这部著作将烹饪视为与语言、服装、建筑并列的人类文明要素,书写了一部“口味的全球史”。罗马军团带着橄榄油和葡萄酒北上,阿拉伯商人将柑橘和甘蔗西传,蒙古铁蹄的通行路线也是羊肉抓饭的传播路线,大英帝国的海军补给需求催生了罐头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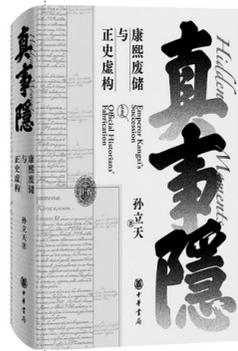
劳丹在书中对“工业饮食”进行了辨析。当代饮食话语中,“自然”“手工”“本地”占据了高地。工业食品渐渐被视为廉价、寡味、不健康。劳丹反对此论,她认为,工业革命改变了全球饮食:铁路让内陆居民吃上海鱼,冷冻技术打破季节限制,提纯与保存技术终结了人们对食物腐坏的恐惧。“如果我们认为吃到更好食物的方法,就是减少加工环节、回归居家烹饪、缩减采购半径,那我们就切断了将来吃到更好食物的可能。”

传统从来都是流动的。两本书,一条隐藏的对话线。《祖荫下》处理时间的纵向传递:祖辈的价值如何嵌入后代的人格结构,代代相续。《美食与文明》处理空间的横向流动:饮食技术如何在洲际传播。它们共同回答了我们如何能在此团圆。

春节的意义浮现出来,它是文明要素在家庭尺度上的年度整合仪式。祖荫与远方,在此夜共聚一桌。劳丹在《美食与文明》全书的最后一行写道:“烹饪的未来,不在回到过去,而在向前走,带着历史留给我们的全部工具。”这句话,恰好也道出了春节餐桌的含义。

荐书

历史的旋律



《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
中华书局

像其前作《康熙的红粟》一样,孙立天从一套在罗马尘封三百余年、由昔日往来清宫内廷的传教士所作的日志《北京纪事》中发现,其关于康熙废储、复立太子期间相关人与事的记述,与康熙朝《实录》全然不同。由此切入,本书讲述了一个“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故事。



《笔与剑:先秦历史的旋律》
河北教育出版社

黄朴民深耕先秦两汉思想史与中国军事史领域,在本书中聚焦先秦历史与兵学文化,勾勒出了先秦政治文明演进与兵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内容涵盖先秦政治文明趋势与战略格局、《孙子兵法》文本释读与本义考证、兵学源流演变等。在众多话题中,作者颇有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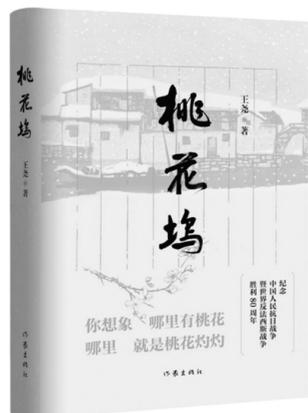


《她们的西南联大岁月》
团结出版社

本书将聚光灯对准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太太这一群体,刻画她们的形象,讲述她们的故事,填补了西南联大历史书写的一个空白。通过书中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我们看到,她们是西南联大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她们的作为,为西南联大精神增添了温暖而厚重的底色,更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动荡年代中的生命力量。

江南梦寻——记忆与历史的精神还乡

胡书明



王尧的长篇小说《桃花坞》以江南古镇为叙事支点,在方志档案、民间记忆与个人沉思的三重奏中,重构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地图。

《桃花坞》是一部以方家三代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史,也是一部以桃花坞为样本的现代中国地域发展史。作家用20余万字郑重地重构了几代文化人,让他们扎根此地,在此生养,在此富足,也在此磨难,最终在此生离死别、星散天下。小说用大历史和小细节,也用

最基本的日常与伦理赋予他们血肉,让他们成为活生生的桃花坞人。因为他们,桃花坞之于苏州,之于20世纪上半叶艰辛苦难又不懈奋争的中国,有了切实的关联和意义。

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追溯到辛亥革命,延伸到解放战争,书写了苏州桃花坞大街方家和黄家两户文人家庭的命运。青年主人公方后乐和黄青梅的成长和感情历程是小说的主线。小说牢牢锁定中国20世纪风云激荡的50年,通过一个江南知识青年的成长和命运选择,展现的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整体的心路群像,无论是入世和避世,无论是新文化和旧文化,无论是长期和短期,桃花坞永在血脉中飘荡,而时世动荡中,如何守护桃花坞,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丰富而深刻展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知识分子最深最不可撼动的家国的情怀。小说写尽温柔细腻,也难掩大气沉厚,其历史感、市井气和思想深度为当代小说创造了新气象。《桃花坞》宽阔、博学、温厚,确有长篇小说雍容开张的风度。

作为回应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紀念的作品,《桃花坞》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它以事实性和事件性为叙事基础,真切地描写了姑苏文化记忆,尤其是与姑苏历史密切相

关的姑苏城的文化地理环境,强化了姑苏文化记忆的历史实存性。针对日本侵略者践踏苏州古城的行径,这些文化记忆的重写控诉了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小说对姑苏记忆的追怀,不只是重现了江南生活胜景,更是展示了江南文人的风骨品格。对方家三代人的描写,展现了姑苏文化历经古典到现代的传承,并且在现代的展开中开辟出革命性的前景,这是姑苏文化在少年中国这一脉上的新生,也是江南文化在民族自觉意义上的迸发。

作为一位文学教授,王尧近年投身于小说创作,成就斐然。从2003年《纸上的知识分子》开始,王尧就投身于散文写作,文笔越写越有韵味,文章越写越深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王尧的文学笔法,火候已经淬炼到位。《桃花坞》是为纪念抗战献上的一部文化记忆,一部姑苏儿女的生活史,当然也是生命史册。这部作品表达的主题就是苏州城的文化史。源远流长的吴越文化,在日本侵华的炮火下所遭遇到的劫难,由此反映出江南文化的遭遇,反映出几代江南人在历史大事件演变中的抉择。这部小说有着非常写实的笔法,注重江南生活的细节,江南的人情世故,这就是姑苏的文化记忆,它以事实性和史实性作底,以历史大事件作为背景,小说如同历史画卷一样徐徐展开。既真切,又生动;既温婉,又坚定;既

痛楚,又倔强。生活的意味与文化底蕴成就了这部作品,历史的节点又把它提升到精神史的高度。

从文化地理学视角来看,桃花坞作为姑苏文化的核心表征,彼时仍保持着“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传统形象,但其精神内核已因战争阴云而暗流涌动。方后乐“多数时间蜷缩在房间里,就是个个体对家庭变故的情感回应,更隐喻着江南文化在外部冲击下的‘自我蜷缩’——这种内敛应急的身体表征,为后续文化记忆的坚守与抗争埋下叙事伏笔。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理论,此时的桃花坞已超越地理空间范畴,成为承载江南文化集体记忆的‘象征性空间’,其即将面临的炮火摧残,本质是文化记忆载体的姑苏城的物理性破坏与精神性考验。

将地方志、口述史、档案文献、个人记忆统统作为叙事资源,在文体的边缘地带开疆拓土,王尧开辟了一条“知识考古学”路径。通过将地方知识问题化、历史化,小说既能保持对乡土中国的深情凝视,又能完成对现代化进程的冷峻剖析。桃花坞既是精神原乡,又是审视支点——这正是王尧作为学者作家的独特优势。

王尧用一部《桃花坞》告诉读者:真正的故乡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来处,而是我们反复追问、永远无法抵达的精神彼岸。而这追问本身,就是文学古老、永恒的使命。